



高校社科文库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 Series

教育部高等学校
社会发展研究中心

汇集高校哲学社会科学优秀原创学术成果
搭建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学术著作出版平台
探索高校哲学社会科学专著出版的新模式
扩大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科研成果的影响力



驾驭“暴力”与“激情”的战略 领导：丘吉尔大战略思想研究

于海峰/著

The Strategic Leadership in
Reining Violence and Passion: A Study of
Churchill's Grand Strategy Thought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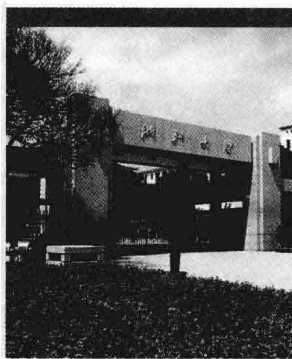
光明日报出版社



高校社科文库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 Series

教育部高等学校
社会发展研究中心

汇集高校哲学社会科学优秀原创学术成果
搭建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学术著作出版平台
探索高校哲学社会科学专著出版的新模式
扩大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科研成果的影响力



于海峰/著

驾驭“暴力”与“激情”的战略 领导：丘吉尔大战略思想研究

The Strategic Leadership in
Reining Violence and Passion: A Study of
Churchill's Grand Strategy Thoughts

光明日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驾驭“暴力”与“激情”的战略领导:丘吉尔大战略思想研究/于海峰
著. —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10. 4

(高校社科文库)

ISBN 978-7-5112-0692-3

I. 驾… II. 于… III. ①丘吉尔, W. L. S(1874~1965)—
军事思想—研究 IV. E095. 6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057894 号

驾驭“暴力”与“激情”的战略领导:丘吉尔大战略思想研究

作 者:于海峰 著

出 版 人:朱 庆

责任编辑:祝 菲 刘伟哲

封面设计:小宝工作室

责任校对:李 莹 李 安

责任印制:胡 骑 宋云鹏

出版发行:光明日报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崇文区珠市口东大街 5 号,100062

电 话:010-67078241(咨询),67078245(发行),67078235(邮购)

传 真:010-67078227,67078233,67078255

网 址:<http://book.gmw.cn>

E - mail: gmcbbs@gmw.cn

法律顾问:北京市华沛德律师事务所张永福律师

印 刷:北京大运河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装 订:北京大运河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开本:690×975 毫米 1/16

字数:290 千字

印张:16.25

版次:2010 年 4 月第 1 版

印次:2010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ISBN 978-7-5112-0692-3

定价:36.00 元



CONTENTS 目 录

导 论 / 1

0.1 选题依据 / 1

0.2 研究现状与文献回顾 / 3

0.2.1 大战略理论与实践研究 / 3

0.2.2 丘吉尔的著作与档案 / 10

0.2.3 丘吉尔传记与研究专著 / 13

0.3 研究方案 / 21

0.3.1 主要研究内容 / 21

0.3.2 特色与创新点 / 22

0.3.3 研究方法 / 23

第1章 大战略思想与三位一体理论 / 25

1.1 大战略的概念及其演进 / 25

1.1.1 从战略到大战略 / 25

1.1.2 大战略概念的演进 / 28

1.1.3 大战略概念的界定 / 31

1.2 大战略基本原则 / 32

1.2.1 大战略的首要出发点：大战略的目的 / 33

1.2.2 大战略目的与手段 / 37



1.2.3	大战略的全局性与灵活性	/ 41
1.2.4	作为艺术的大战略：领导人与决策体制	/ 43
1.3	战争三位一体理论	/ 46
1.3.1	绝对战争与现实战争的对立统一	/ 47
1.3.2	克劳塞维茨推演中的战争三位一体性质	/ 50
1.3.3	理性—暴力—激情的三位一体与大战略	/ 54
第2章 变动时代中的丘吉尔 / 57		
2.1	英国战争方式：战略思维传统对丘吉尔的影响	/ 57
2.1.1	“绥靖”	/ 57
2.1.2	联盟	/ 60
2.1.3	马汉对麦金德	/ 60
2.1.4	财政制度与援助	/ 63
2.1.5	战后安排的审慎与理智	/ 65
2.1.6	战略传统及其影响	/ 66
2.2	丘吉尔所处时代：维多利亚时代的终结与现代政治的兴起	/ 67
2.2.1	变革	/ 67
2.2.2	丘吉尔：维多利亚时代的遗产	/ 68
2.2.3	新趋势	/ 74
第3章 丘吉尔的经历 / 86		
3.1	出身、青少年与军人	/ 87
3.1.1	崇敬、赞誉与关怀：出身与青少年	/ 87
3.1.2	浪漫与理性：独立生活与军人	/ 90



3.2	传记作家、历史学家与自我教育	/ 101
3.2.1	雏形	/ 102
3.2.2	反思与形成	/ 104
3.2.3	大成	/ 108
3.3	国务家与大战略思想的缔造	/ 109
3.3.1	雏型	/ 109
3.3.2	反思与成熟	/ 112
3.3.3	最光辉的时刻	/ 117
3.4	消遣：作为休闲的绘画及其他	/ 121
3.4.1	绘画与战略	/ 121
3.4.2	休闲：劳逸结合	/ 126
第4章	国务家的大战略地位	/ 129
4.1	勇毅、睿智与敦厚：丘吉尔作为大战略领导人的独特素质	/ 129
4.1.1	激情、勇气与坚忍不拔	/ 130
4.1.2	理性估算、果敢与智慧	/ 137
4.1.3	分寸与宽容敦厚：理性与激情的结合	/ 144
4.2	全局观念与大战略目标	/ 149
4.2.1	洞察力	/ 149
4.2.2	全局观念与大战略目标确定	/ 150
4.2.3	战略优先权	/ 152
4.2.4	念念不忘根本目标	/ 156
4.3	国务家与制度：丘吉尔与大战略决策机制	/ 157



- 4.3.1 英国战略决策体制的演变 (1689~1904) / 158
- 4.3.2 丘吉尔与创造性的组织变革 / 159
- 4.3.3 英国委员会体制与丘吉尔大战略领导 / 161
- 4.3.4 备忘录：细节与行动 / 165

第5章 “理性”统领“暴力” / 168

5.1 政治统帅军事 / 169

- 5.1.1 暴力、情感冲动与毁灭 / 169
- 5.1.2 英雄对专家：现代大众社会的集体效应 / 172
- 5.1.3 专家的缺陷与政治家的介入 / 174

5.2 战争中的文职控制 / 177

- 5.2.1 “通常”理论 / 178
- 5.2.2 国务家与他的将军们的真正关系 / 178
- 5.2.3 理想大战略领导人及其实现 / 180
- 5.2.4 争吵与和谐 / 181
- 5.2.5 纽带式人物的存在 / 182

5.3 丘吉尔和他的将领：争吵中的关系 / 182

- 5.3.1 费舍尔勋爵：与军人的初次合作 / 182
- 5.3.2 意见相左的将军们 / 184
- 5.3.3 监工 / 188
- 5.3.4 质量检验员 / 189
- 5.3.5 政治的触角 / 191
- 5.3.6 犯错与挑错 / 192



第6章 “理性”引导“激情”	/ 194
6.1 语言：深入灵魂的工具	/ 195
6.1.1 语言上的成就	/ 195
6.1.2 修辞与技巧	/ 196
6.1.3 演讲风格	/ 202
6.1.4 语言的力量	/ 204
6.2 象征：英国的团结	/ 208
6.2.1 形象与意义	/ 209
6.2.2 形象、象征	/ 212
6.2.3 传播希望、信心与勇气	/ 214
第7章 丘吉尔的大战略思想及其启示	/ 219
7.1 丘吉尔控制不确定性的战略艺术	/ 219
7.2 丘吉尔的大战略思想特质与风格	/ 223
7.2.1 记录优良的大战略家	/ 223
7.2.2 特质与风格	/ 225
7.3 丘吉尔大战略思想的深层逻辑及其启示	/ 230
7.3.1 理性、暴力与激情的和谐统一	/ 230
7.3.2 丘吉尔大战略思想的启示	/ 233
参考文献	/ 236



导 论

0.1 选题依据

本人拟写作的题目为“驾驭‘暴力’与‘激情’的战略领导：丘吉尔大战略思想研究”。就选题的范畴而言，它属于大战略思想史研究。大战略思想史研究旨在探索国家处理多种军事和政策目标之间资源分配及其轻重缓急次序^①的实践以及背后的各种心理、观念等深层因素；同时，这种军事和政策目标又和政治、外交、经济以及战争与和平等问题相互渗透、密不可分。而以丘吉尔这位 20 世纪，甚至是整个人类历史上最为伟大的国务家之一作为研究对象，不仅在于他那基于整个 20 世纪上半叶的丰富的战略与国务活动，还在于他作为一位伟大的历史与传记学家，其作品字里行间所闪现的大战略思想的光辉。正是这种基于时代的国务实践和深邃的历史洞见的结合，造就了丘吉尔这样一位伟大的大战略家。

大战略思想史研究对于大战略理论研究有着独特而重要的意义。首先，大战略思想研究重视考察源流关系，这对揭示和理解特定条件下产生的大战略思想与实践背后的深层逻辑有着重要意义。其次，大战略思想研究本身就可以纳入大战略理论研究范围。一方面，在大战略思想自身发展和演进过程中归纳和提炼出来的大战略核心概念，构成了现代大战略理论构建和创新的基础。另一方面，由于大战略思想往往能够为大战略理论的构建发掘出深厚而坚实的历史与哲学基础，因而可以使理论在逻辑上更加严密和完整。总之，一定的大战略思想只有在其特定的历史与社会环境中才能够具有真实的意义。由于大战略思

^① Kimberly Kagan, “Redefining Roman Grand Strategy”, *The Journal of Military History*, April 2006, Vol. 70, No. 2, p. 333.



想史研究既擅长把握历史的脉搏，又对当代实践有着深切的关怀，因此，通过研究大战略思想史可以真正理解与应用大战略理论观念。研究大战略理论的最好方法就是“理解过去的大战略是如何被制定与实践的。战略思想家与实践者们——从公元前六世纪的孙子到当代的CEO们——都必须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中进行研究。只有通过历史研究，我们才能够从本质上理解大战略及其机理，以及特定环境中大战略家的思想与行为”^①。因而，迄今为止最杰出的大战略理论研究大多都是从大战略史中汲取养分，即“实际上只有通过历史（战略史）的考察、探究或研习，才能构建、理解或高效应用战略理论或战略观念”^②。

就人物思想研究而言，选取现代英国乃至世界历史上最为重要的政治家温斯顿·莱昂纳多·斯宾塞—丘吉尔（Winston Leonard Spencer-Churchill）作为研究对象，从其国务实践以及丰富的著述着手，系统地发掘其大战略思想与实践经验，以大战略的相关理论为线索，逻辑地构建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与时代主题下所体现的其独具特色的大战略思想与实践体系，能够更深刻地揭示与理解大战略理论，从而达到更好地应用大战略理论以解决当代现实问题的目的。首先，从某种意义上讲，作为当代世界最重要的缔造者之一的丘吉尔，他的一生几乎就是英国以及世界由近代历史向现代历史转变的缩影。以其作为大战略思想史的研究对象，既反映了大战略最为经久的问题，例如军政关系，也反映了时代所带来的新的问题，例如大众政治的兴起。其次，既为学者又为国务家的历史人物，对于世界历史进程产生了如此之大的影响的，除了丘吉尔之外，极为罕见。因而，研究丘吉尔的大战略思想既是对大战略实践的研究，也是对于思想家的思想的研究，仅从这点而言，本研究就具有其独特的意义。另外，以往有关丘吉尔的研究虽然极为丰富，但是专门严肃而认真地对他的大战略思想进行的系统专题研究并不多见，从这个意义而言，本项研究对于丘吉尔研究也有一定的完善与充实作用。

就该选题的现实意义而言，正如上文所提到的，对于往昔大战略实践者的考察与分析，实际上具有深层次的现实关怀。作为当代早期世界历史上最杰出的国务家之一，丘吉尔独特的大战略思想与实践，如果经过理论的抽象，就能

① Paul Kenney and John Lewis Gaddis, ed., *Introduction to the Grand Strategy Project 2002 ~ 2003*, International Security Studies, Yale University, <http://www.yale.edu/iss>.

② 时殷弘，“战略史考察与大战略理论”，《史学月刊》，2005年第6期，第8页。



够对当代国务家以及理论家起到极为重要的指导作用。首先,丘吉尔对于同时代的国际体系、国家命运以及英国应该具有的大战略有着其独特的认知,而他的这种认知是基于其对历史经验的理解之上的。实际上,丘吉尔不仅仅是一位国务家,他还是一位对战时政治领导所应具有的能力与智慧进行了充分研究的学者,其一生的历史研究与写作经历使他对于战争与战略问题的脉搏有着准确的把握。因而,精确地把握历史教益,深刻地理解历史对于大战略理论家构建理论体系、国务家进行大战略实践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其次,丘吉尔具有的既热情奔放又镇静自若,既敏感睿智又坚忍不拔,既面对现实又富有想象力,既拥有广阔的视野又具有宏伟的全局观念等品质,对于当代领导人而言,仍然是必不可少的素质。最后,丘吉尔大战略实践本身对于当代国务家的实践与大战略理论家的理论构建仍然有着独特的指导作用。

0.2 研究现状与文献回顾

0.2.1 大战略理论与实践研究

鉴于本项研究首先是对丘吉尔的大战略思想的研究,所以首先要进行梳理的文献就是为本项研究提供理论基石的有关大战略或者战争与和平问题的著作。

虽然军事战略的研究已有很长的历史,而且一些经典军事战略与战术著作也涉及到了一些有关大战略的思想片段^①,但是,真正使战略研究由军事领域扩展到政治领域的人是马基雅维利和克劳塞维茨,虽然他们的研究还有许多不足。马基雅维利通过对战争性质的洞察和对军事组织在社会结构中的作用的分析,明确地将战争与政治联系在一起^②。而对于当今大战略思想家,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大战略思想家们影响最为深刻的则莫过于克劳塞维茨了。

① See in Sun Tzu, *The Art of War*, translated and introduced by Samuel B. Griffith, Oxford, U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1; Carl von Clausewitz, *On War*, edited and translated by Michael Howard and Peter Paret,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6; Antoine Henri De Jomini, *The Art of War*, London, UK: Greenhill Books, 1992; Also in Thomas R. Phillips, ed., *Root of Strategy, The 5 Greatest Military Classics of All Time*, Harrisburg: Stackpole Books, 1940; *Root of Strategy, Book 2, 3 Military Classics*, Harrisburg: Stackpole Books, 1987; *Root of Strategy, Book 3, 3 Military Classics*, Harrisburg: Stackpole Books, 1991; David Jablonsky, ed., *Root of Strategy, Book 4, 4 Military Classics*, Harrisburg: Stackpole Books, 1999.

② 费利克斯·吉尔伯特,“马基雅维利:战争艺术的复兴”,彼得·帕雷特主编,《现代战略的缔造者:从马基雅维利到核时代》,时殷弘等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6年,第2~22页。



他认为“战争绝非是独立的，而仅仅是政治的一部分”，“任何战争可能的特征和总体的形态应当主要由政治因素和条件来确定”^①，从而将战争从属于政治和政策这一根本性的观念明确地引进了大战略思想。在克劳塞维茨那里，战争是暴力、不确定性（概然性和偶然性）和政治从属性的三位一体。更进一步地，他将这种三位一体归结为盲目的自然冲动、自由的精神活动与纯粹的理性活动，并使之与民众、军队以及政府相联系，而这种三位一体的三种倾向像三种不同的规律一样隐藏于战争性质之中，同时起着不同的作用。因而分析或者理解战争，或者为了规划或进行战争，就需要研究或者利用所有这三类要素。因此，理论或者领导必须悬吊在暴力、偶然性和政治这三块磁石之间。^②克劳塞维茨的这种三位一体的思想，在某种意义上揭示了在国家层面上的大战略运用的必要，因而他“远远越出了战略思想在其中运行的成败界限，进至对战争的终极性质和动能进行探究。将令人感到舒服的是相信这种智力理解不仅构成有效战略的基础，而且有助于负责任的军事政策和治国方略”^③。因此《战争论》也无愧为“单独一部最具影响的大战略著作”^④。

系统而明确的大战略观念则是在 20 世纪产生的。^⑤第一个使用并且进行论述“大战略”观念的是英国著名学者李德·哈特（Basil H. Liddell Hart）。哈特的大战略思想对于现代早期英国战略思想的塑造产生了重大的影响。首先，哈特为《大英百科全书》中的“战略”词条撰写定义时采取了上述看法，

① Carl von Clausewitz, *On War*, p. 605, 607.

② 克劳塞维茨的三位一体观念贯穿于《战争论》全书，在其第一、第二、第八篇表现得尤其明显。三位一体的论述最为集中的是在第一篇第一章的结尾，见克劳塞维茨，《战争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8 年，第 23～47 页。Carl von Clausewitz, *On War*, pp. 75～89. 彼得·帕雷特，“克劳塞维茨”，彼得·帕雷特主编，《现代战略的缔造者》，第 192～195 页。

③ 彼得·帕雷特，“克劳塞维茨”，第 206 页。

④ Paul M. Kennedy, John Lewis Gaddis, eds., *The Grand Strategy Project*, International Security Studies, Yale University, <http://www.yale.edu/iss>.

⑤ 德国鲁登道夫（Erich Friedrich Wilhelm von Ludendorff）“总体战”（The Total War）的概念，见钮先钟，《西方战略思想史》，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 年，第 421～428 页；法国安德烈·薄富尔（A. Beauful）也提倡所谓总体战的思想，薄富尔认为，战争将在政治、经济、外交、军事等所有领域展开，因此，战略也必须是总体的。这样，薄富尔就使得战略观念进一步脱离了战争对其的限制。同一时期，英国军事史学家富勒（J. F. C. Fuller）提出“大战略家必须是饱学的历史学家，远见的哲学家，敏锐的战略家”，见钮先钟，《西方战略思想史》，第 451～454 页。巧合的是，丘吉尔的国务活动开端恰恰是作为 20 世纪开端的 1900 年，而战争与和平的问题也一直影响着他的的一生。现代早期的很多大战略思想家与丘吉尔也或多或少地存在着一些交集。这样一种有趣的巧合，对于选择丘吉尔作为本项研究的对象，也有着一定的影响。



从而获得了英国官方的肯定，并于1935年写入了英军野战条例中。同时，哈特的大战略思想对英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战略计划的制定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另外，哈特所撰写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史》也对丘吉尔战时政府所采取的战略政策进行了一定的评判，这对研究丘吉尔的大战略也有这一定的参考价值。然而，哈特虽然首创了“大战略”的概念，但是他的思想仍然主要集中于军事思想之上，其大战略思想缺少系统的阐发，还不能称之为一种理论，而仅仅是一种观念。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到20世纪80年代，很多学者，尤其是美国学者又进行了更为广泛与深刻的探索。在这一时期，出现了一些在大战略理论发展历史上起着重要作用的论著^①。1976年著名战略理论学家爱德华·鲁特瓦克（Edward Luttwak）在其名著《罗马帝国的大战略：从公元一世纪至三世纪》，将对于现实的思考融入到罗马战略史的思考之中，揭示了一些大战略的根本问题^②，但作为一个非专业的罗马史学者，他在资料收集与使用方面还有一些不足，因而对于大战略的目标与手段关系的论述还不充分。^③1982年约翰·路易斯·加迪斯（John Lewis Gaddis）发表《遏制战略：战后美国国家安全政策评析》，从战略的视角重新解释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整个美国国家安全政策。^④“在全书各处非常频繁、精彩和原创性地揭示了（寓于美国遏制战略史中的）许多精微复杂的大战略机理，在这方面可以说是显著超过了其他任何一位著名的大战略阐释者。没有他的那种历史研究，他的大战略理论建树是不可能的”^⑤。1986年著名战略学家彼得·帕雷特重新编著了《现代战略的缔造者》，并将之更名为《现代战略的缔造者：从马基雅维利到核时代》，虽然这

① 如：约翰·柯林斯，《大战略》，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译，北京：战士出版社，1978年；Harry G. Summers, Jr., *On Strategy, A Critical Analysis of the Vietnam War*, Novato, CA, Presidio Press, 1982；爱德华·鲁特瓦克，《战略——战争与和平的逻辑》，军事科学院外国军事研究部译，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0年；Burry Buzan, *An Introduction to Strategic Studies: Military Technolog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London: Macmillan, 1987；戴维·阿布希尔，《防止第三次世界大战：现实大战略》，军事科学院外国军事研究部译，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1991年；丹尼斯·德鲁，唐纳德·诺斯著，《国家安全战略的制定》，王辉青等译，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1991年。

② 比如他揭示了为何在当时那种落后的交通与通讯条件下，罗马帝国能够保证如此大规模的扩张；以及罗马帝国为何这样持久这两个关键性大战略问题。See in Edward Luttwak, *The Grand Strategy of the Roman Empire: From the First Century A. D. to the Third*,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76, pp. 1~5.

③ 李相，《现当代西方大战略理论探究》，中国人民大学博士论文，2006年。

④ 约翰·加迪斯，《遏制战略：战后美国国家安全政策评析》，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5年。

⑤ 时殷弘，“战略史考察与大战略理论”，第10页。



部经过修订的著作与其最早的版本相似，仍然偏重于对于军事战略的论述，而对于严格意义上的大战略概念与内涵并未详细阐发，但是，在早期版本基础上，这部文集视野更广阔，更关注现代大战略的形成，从而明晰了现代战略形成的线索。^① 总体而言，这一时期对于大战略的研究虽然还不是那么系统，而且很多研究中军事思想占据了很大的部分，但是其中所体现出的系统的大战略基本思想为大战略理论与大战略史的研究提供了进一步的话语体系与研究资料。

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大战略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步。^② 1994 年威廉森·默里等主编的《缔造战略：统治者、国家与战争》提供了大战略的经典历史案例，揭示了地理、历史、心理、经济、政府组织、军事体制乃至个人等因素对于大战略成败的影响，比较完整地展示了影响大战略的诸因素。^③ 1998 年，杰出的史学家杰弗里·帕克出版了其无论是在历史学界还是在战略学界都影响深远的《腓力二世的大战略》一书，这是迄今为止最杰出的大战略史方面的著作之一。在这本书中，帕克以历史中失败的大战略作为研究对象，通过揭示西班牙腓力二世大战略失败的根源，突出了战略文化、领袖特质以及不确定性对大战略制定与运行的重大意义。^④ 这两部著作都将现代理论嵌入到大战

① 例如，戈登·A. 克雷格和费利克斯·吉尔伯特在“关于当今和未来的战略的思考中”，就提出“战略不仅仅是这么一种艺术：为一个国家可能会变得卷入其中的武装冲突作准备，以争取最后获胜的方式规划国家资源的使用与其武力的部署。它在一种更广泛的意义上，还是 17 和 18 世纪期间所谓‘国家理由’的现代等同物。它是合乎理性地确定一国的紧要利益，确定对其安全必不可少的需要，确定它在同别国的关系中的基本目的，确定它关于各项不同目标的轻重缓急次序。这一广义形态的战略应当鼓舞和指导关于规划战争和打仗的较狭义的战略。”见彼得·帕雷特主编，《现代战略的缔造者》，第 845 页。

② 除了正文所列出的这些比较重要的学者及其著作以外，这一时期对于大战略理论与大战略史研究起到了一定贡献的学者与著作还包括：约翰·阿奎拉、戴维·伦菲尔德等著，《决战信息时代》，宋正华等译，长春：吉林出版社，2001 年。见夏征难，“国外大战略研究的历史演变”，《军事思想史研究》，2007 年第 4 期，第 51 页；Colin S. Gray, *Modern Strateg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Las S. Skålne, *Politics, Markets, and Grand Strategy: Foreign Economic Policies as Strategic Instruments*, Michigan,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2000.

③ 威廉森·默里、麦格雷戈·诺克斯、阿尔文·波恩斯坦编，《缔造战略：统治者、国家与战争》，时殷弘等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5 年，特别见威廉森·默里、马克·格利姆斯利，“导论：论战略”以及麦格雷戈·诺克斯，“结论：缔造战略方面的连续和变革”。

④ 正如一位评论家所言，帕克为我们展示了腓力二世失败的三个原因，即他不愿意放弃任何东西；他寄希望于上帝，希望上帝赐予其胜利；他总是高估自己的能力。因而作为一个大战略领导人，腓力二世是不合格的。另外，同他失败的第一个原因相联系的是，他树立了太多的敌人，而每个敌人都需要他耗费大量的精力与资源去对付，这耗尽了庞大的西班牙帝国的每一分钱。而这正为我们提供了大战略成功的几项经久因素的反例。See in Robin G. Macpherson, “The Grand Strategy of Philip II (Book View)”, <http://www.history.ac.uk/reviews/paper/macpherson.html>.



略史的研究之中,从而折射出战略史研习对于现实大战略缔造的深远意义。

进入21世纪以来,大战略研究日趋成熟,其理论化程度也日渐突出。其中,埃利奥特·科恩于2003年发表的《最高统帅:战争中的元首与他的将军们》尤为重要。通过探讨林肯、克列孟梭、丘吉尔以及本—古里安的领导素质以及他们如何处理文人政治家与军事领导人之间的紧张关系,埃利奥特·科恩为我们揭示了战时大战略领导人的一个基本方面,即如何处理军政关系这一大战略的最基本问题。^①

在所有的大战略思想家之中,哈特的弟子保罗·肯尼迪是当代最杰出的战略思想家之一。他的著作^②,尤其是他的专著《大国的兴衰:1500—2000年的经济变迁与军事冲突》与他主编的论文集《战争与和平的大战略》是李德·哈特之后大战略发展的重要著作。不仅如此,肯尼迪与加迪斯等从2000年开始在耶鲁大学开办影响深远的大战略讲习班^③,并给大战略下了一个相对比较恰当的定义。^④毫不夸张地说,通过对于历史的大战略解读,肯尼迪以其宏观的视野,丰富和完善了大战略理论,并使其更具有历史感,从而使其对于现实的指导意义更为加强了。^⑤

总体而言,西方大战略理论的研究已经进入到了一个比较成熟的阶段。首先,西方大战略研究虽然没有一个固定的模式,但是在这种多样化的研究背后,的确隐藏着对于大战略的一些基本方面的共识,例如对于大战略的基本目标,目标与手段的关系,大战略的一些基本原则,战略资源、战略文化以及对

① Eliot A. Cohen, *Supreme Command: Soldiers, Statesmen, and Leadership in Wartime*, Anchor Books, 2003. 埃利奥特·A. 科恩著,《最高统帅:战争中的元首与他的将军们》,徐刚、杨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4年。

② Paul Michael Kennedy, *The Rise and Fall of British Naval Mastery*, London, UK: Allen Lane, 1976; *The War Plans of the Great Powers, 1880~1914*, Winchester, Mass.: Allen & Unwin, 1979; *Strategy and Diplomacy, 1870~1945: Eight Studies*, Bucks, UK: Allen & Unwin, 1983;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Great Powers: Economic Change and Military Conflict from 1500 to 2000*,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87 (保罗·肯尼迪著,《大国的兴衰:1500—2000年的经济变迁与军事冲突》,陈景彪等译,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6年); *Grand Strategies in War and Peace*,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1. (保罗·肯尼迪编,《战争与和平的大战略》,时殷弘、李庆四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5年。)

③ 该讲习班通过对历史上战略行为、战略思想的深入分析,总结出制定合理化大战略所应具备的一系列原则,从而为未来的领导者培养提供可资学习汲取的丰富资源。

④ Paul M. Kennedy, John Lewis Gaddis, eds. *Introduction to the Grand Strategy Project, 2002~2003*, International Security Studies, Yale University, <http://www.yale.edu/iss>.

⑤ 关于保罗·肯尼迪的大战略思想,具体见时殷弘、魏长春,“保罗·肯尼迪的战略思想”,《美国研究》,2001年第2期,第36~53页。



战略领导人的认知等。就本项研究而言，这种基本共识提供了对于丘吉尔大战略思想认识的一个基本脉络，通过认知这些基本方面，我们可以初步将纷繁复杂的丘吉尔大战略实践进行梳理、定焦，从而发现这些现象之后所隐藏的一些基本逻辑。其次，在研究方法上，西方大战略研究既重视历史与哲理考察，也注意应用定量分析与实证考察等社会科学研究方法。作为一种悠久的传统，西方大战略研究既重视战略史与思想史的考察，也关注大战略理论建构。许多优秀的大战略理论著作，同时也是优秀的大战略史或思想史的著作。这种研究方式深切把握历史脉搏，同时又关注现实，因而往往能够为大战略理论的构建发掘出深厚而坚实的历史与哲学基础，因而可以使理论在逻辑上更加严密和完整。同时，新方法的引入，使得大战略研究的成果更加令人信服。同样地，对于本项研究而言，这种既深切把握历史脉络，又注意新方法的应用的研究方式，对于透过丘吉尔错综复杂的大战略活动，发现隐藏于这些活动背后的逻辑，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是，需要看到的是，系统的大战略研究迄今为止不过一甲子，还有很多空白与模糊，甚至是疏漏与错误之处，需要更进一步的探究。本项研究希望通过对于丘吉尔的大战略思想的发掘，能够对于这些空白与模糊之处提供一些有益的补充、优化与校正。

大战略研究在中国，则是到了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才开始真正兴起的。按照李柁博士的观点^①，目前中国的大战略研究正处于全面认识与学习阶段，成果大致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以挖掘中国古代战略思想为己任，希望通过对中国传统思想的挖掘找出中国独特的战略思想；第二类学者主要对西方大战略理论的源流与内涵进行研究与分析，并将之运用于中国大战略研究与实践；第三类学者偏重于对大战略的实证分析。第一类学者中，以台湾钮先钟老先生所作的研究最为突出。他学贯东西，不仅熟知西方战略思想史，而且对中国古代战略思想的研究颇深。遗憾的也许是他将精力过多地放在阐发前人的战略思想之上了，因而其独创性的研究成果并不太多。而第二类学者中最具代

^① 有关中国大战略研究现状，主要参考李柁的《现当代西方大战略理论探究》。



表性的莫过于时殷弘教授^①了。时殷弘教授对于西方大战略思想的源流与理论进行了深入的考察,并对大战略的根本信条、基本问题以及内在机理作了详细的阐发,并在此基础上,对大战略理论进行了一定的创新。^②第三类学者主要以门洪华、胡鞍钢等为代表^③,他们研究的主要特点是在研究方法上,即以历史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的实证方法进行研究;但同时他们对于大战略思想的源流与理论脉络的考察与梳理并不充分,因而对于大战略理论与原则的把握也有所不足。总体而言,国内学者对于大战略的认知还处于初始阶段,对于大战略的内涵与基本问题的认识还比较模糊,并且界定也比较混乱,这既与国内研究起步较晚有关,也与思想观念以及语言等障碍有一定关系。

① 时殷弘教授关于大战略思想与大战略史的论文与专著主要包括:“国际政治的实际性规律与马克·布罗利的启示”,《世界经济与政治》,1999年第3期;张春、时殷弘,“大战略——理论与实例分析”,《世界经济与政治》,1999年第7期;“关于台湾的几项必须正视的大战略问题”,《战略与管理》,2000年第2期;时殷弘、魏长春,“保罗·肯尼迪的战略思想”,《美国研究》,2001年第2期;“风物长宜放眼量——谈中国应有的外交哲学和世纪性大战略”,《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2期;“从大战略角度看美国的危机处理——从9.11到进攻阿富汗”,《世界知识》,2001年第21期;《国际政治:理论探究·历史概观·战略思考》,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2002年;时殷弘、宋德星,“作为大战略组成部分之一的对外经济战略——《美国对外经济战略》述评”,《美国研究》,2003年第3期;《从拿破仑到越南战争——现代国际战略十一讲》,北京:团结出版社,2003年;“中国近期主要对外战略问题——兼论长期性基本战略机遇”,《战略与管理》,2003年第6期;“国家大战略理论与中国的大战略实践”,《现代国际关系》,2004年第3期;《21世纪初世界政治的基本性质和中国的应有战略》,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国际政治与国家方略》,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时殷弘、惠黎文,“战略、制度和文化的较量——第二次布匿战争中的罗马与迦太基”,《世界经济与政治》,2007年第4期。

② 这一类学者及其论著主要还包括:许嘉、张晓军,“论冷战后美国大战略的理论基础”,《世界经济与政治》,1998年第6期;吴春秋,《大战略论》,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1998年;魏长春,“保罗·肯尼迪的战略思想:可供中国借鉴之教益和启示”,《世界经济与政治》,2002年第7期;吴春秋,《论大战略和世界战争史》,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02年;周丕启,“国家大战略:概念与原则”,《现代国际关系》,2003年第7期;周丕启,“国家大战略:目标与途径”,《现代国际关系》,2006年第10期;李彬,《论当代西方大战略理论探究》;周丕启,“大战略的本质与特点”,《国际论坛》,2007年第2期;夏征南,“国外大战略研究的历史演变”。

③ 这一类学者的主要著作包括:门洪华,“冷战后美国大战略的争鸣及其启示意义”,《太平洋学报》,2003年第2期;胡鞍钢主编,《中国大战略》,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叶自成著,《中国大战略:中国成为世界大国的主要问题及战略选择》,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门洪华,“如何进行大战略研究——兼论中国大战略研究的意义”,《国际政治研究》,2004年第4期;门洪华,“关于美国大战略的框架性分析”,《国际观察》,2005年第1期;门洪华,“国家主义、地区主义与全球主义——兼论中国大战略的谋划”,《开放导报》,2005年第3期;门洪华著,《构建中国大战略的框架:国家实力、战略观念与国际制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门洪华,《霸权之翼:美国国际制度战略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